

科学文化

当前位置: 首页 > 科学文化

[【小中大】](#) | [【打印】](#) | [【关闭窗口】](#) |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 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 •

“以道驭术”^[1]

——我国先秦时期的技术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王 前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3)

摘要: “以道驭术”是我国先秦时期技术伦理的基本思想特征。儒家、道家、法家、管子学派和墨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以道驭术”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农业耕作、手工业技术和医疗活动, 其合理成分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以道驭术 先秦时期 技术 伦理 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763(2008)01-0000-00

先秦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奠定丰厚理论基础的时期, 也是我国技术伦理在理论和实践上萌发和成长的时期。我国古代从一般意义上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讨论, 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 指的是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的驾驭和制约。在先秦时期, “以道驭术”的思想观念就已经出现。其中儒家、道家、法家、管子学派和墨家等不同学派, 分别从不同侧面建立了“以道驭术”的技术伦理思想体系。

一、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

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是直接针对技术应用的社会效果而言的, 强调工程技术所产生的宏观社会效果, 力求限制和消除不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论语·述而》中说: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就是说, 道德是包括技术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基础。在技术发展中, 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三事”, 要求技术发展目标既对国计民生有利, 又有道德教化功能。([1], pp.291-292)所谓“六府”, 指的是“水、火、金、木、土、谷”, 即水利、烧荒、冶炼、耕作、贵粟之类。所谓“三事”, 指的是“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学者看来, “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 才是儒家大力抨击的所谓“奇技淫巧”, 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 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有人说儒家学说鄙薄一切科学技术, 将科学技术统称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 这是不正确的。

查史书上关于“奇技淫巧”的解释, 《周书·泰誓下》中曾提到“郊社不修, 宗庙不享, 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礼记·月令》规定, “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礼记·王制》中也抨击“作淫声、异服、奇技以疑众”的行为。显然, 这里的“奇技淫巧”都不是指农桑、水利、建筑、冶铸这一类技术, 因为这一类技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众基本生存, 是儒家一直倡导和强调的技术。在儒家思想长期居正统地位的我国古代社会, 注重发展这一类技术, 曾使我国技术水平在整体上一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诸如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发明, 对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儒家学说真是鄙薄一切科学技术, 怎么会有“四大发明”和其他一度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就呢? 先秦儒家思想抨击“奇技淫巧”的目的在于“以道驭术”, 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用道德规范限定了当时工匠们的技术活动范围, 起到直接约束工匠们的具体技术行为的作用。

先秦儒家抨击“奇技淫巧”, 但对“奇技”与“百工”(即有各种实用技艺的工匠)做了明确区分, 认为后者虽不登大雅之堂, 但还有存在价值。《论语·子张》中说: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君子学以致其道”, “虽小道(按: 指技艺), 必有可观焉; 致远恐泥, 是以君子不为也。”显然, 这里尽管认为“百工”的技艺远不如君子的学问重要, 但对“百工”的社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持肯定态度。不过, 先秦儒家认为同农耕技术相比, 工商活动中的技术在地位上更低一些, 必要时加以限制。如荀子所说: “士大夫众则国贫, 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省工贾, 众农夫, 禁盗贼, 除奸邪, 是所以生养之也。”

先秦儒家还强调“术”要以仁为本。孟子说：“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仁处，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他批评白圭以邻为壑的不符合仁道的治水之术：“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3],p.23,p.81)

儒家伦理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尚书·旅獒》中讲:“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这里的“玩物丧志”、“贵异物”,指的都是“奇技淫巧”之物,而非有用之物。先秦儒家在技术应用的评价标准上强调整节,反对奢侈浪费。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礼,与其奢也,宁俭。”([4],p.1,p.31,p.8)孔子的节用观是跟儒家“爱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儒家主张统治者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反对奢侈浪费的主张,成为我国古代社会“以道驭术”的主旋律。后世许多封建统治者和学者在技术伦理方面“抑奢”的主张和实践,在思想渊源上即发端于此。

二、先秦道家的“以道驭术”观念

先秦道家对“道德”含义的理解,要比儒家的理解更为广泛,其“以道驭术”观念也要比儒家的观念更为深刻。在道家看来,“道”和“德”的内涵都不局限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道”是“先天地而生”的世界本原,而“德”是有得于道,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一定的原则。所以老子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只是广义的道德的一部分。“以道驭术”实际上是由“道”与“术”的本质联系所决定的,而“德”与“技”的结合则是“以道驭术”过程的自然体现。

《庄子·养生主》中有一个人们熟悉的“庖丁解牛”的寓言:“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这个寓言本来是讲如何“解牛”的,为什么梁惠王(文惠君)会把它同“养生”联系起来呢?这里就涉及道家对“道”与“技”的本质联系的理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这个范畴的最初含意是“道路”。“道”蕴含着行走应恪守的目的、途径、步骤、方法。然而,老子所说的“道”,并非指实在的路或行走过程,也不限于各种具体的操作途径或方法。老子认为“道”本身无形,不可言说,这意味着不仅把人们对实在道路的体验抽象掉了,而且把各种具体途径或方法的特性也抽象掉了,留下的只是对于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再做什么”这种步骤性活动本质特征的体验。这一系列步骤性活动的操作规程,对操作者而言是人为的,但根据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的自然本性,应该存在一种合理的、最优的步骤性操作规程,据此形成特定的途径或方法,这就是“技”之上的“道”。“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由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的自然本性共同决定的。它超越了“技”,是“技”的理想境界。追求“技”之上的“道”,目的在于使人为设定的技术规程逐步转化为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技术规程,以至于达到能运用自如、天人合一的程度。因而老子才强调“道法自然”。如果人们的实践活动能够达到“道”的境界,显然对人的生存发展是最为有利的,所以梁惠王才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在《庄子》中,有不少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如轮扁斲轮、佝偻承蜩、运斤成风、津人操舟等等,都体现了这种通“道”之“技”。

由于“道”意味着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或方法,所以寻求“技”之上的“道”,理应造就技术活动各要素之间的和谐。这里不仅指技术操作者与技术工具的和谐,以及技术操作者身心活动的和谐,也包括技术应用中人际关系的和谐、技术活动与社会的和谐、技术活动与自然的和谐。然而,人们不恰当的技术活动却破坏了技术活动各要素之间的和谐,人们发明的器物 and 掌握的技巧反而给人们带来了麻烦,这就意味着技术应用摆脱了“道”的控制,这就是“失德”。先秦道家对技术的不恰当应用带来的不道德现象给予激烈抨击,不仅涉及人际关系与社会生活,也涉及人的身心关系、操作者与工具器物的关系,这是道家“以道驭术”观念的特色所在。而现代学术界讨论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如“技术异化”、“技术的人性化问题”等等,恰恰涉及人的身心关系、操作者与工具器物的关系,而这方面思考在先秦道家那里早就有所体现。

有些学者以为先秦道家厌恶所有工艺技术,而且对后来的技术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因为老子的确说过:“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庄子也讲过:“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搢斗折衡,而民不争。”《庄子》中还有“汉阴丈人”的寓言,其中提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然而,这些看似极端的说法,其实只是在批评技术的不恰当应用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非要取消一切技术的应用。因为庄子在另外一些地方还曾谈过技术应用与道德相容的关系。庄子说:“同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也,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5], p.211, p.264, p.244)

《庄子》一书中对庖丁、梓庆等杰出工匠“道进乎技”的“绝艺”也极为推崇。老子尽管并未直接谈“道”“技”关系,但他引用具体技术事例来说明“有”“无”关系时说过:“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显然,他对这些技术成果的实用价值还是肯定的。老庄作为见解深刻的思想家,不会极端到取消一切技术应用的地步,后人也不应把这种极端见解强加到道家身上。

在对技术应用的评价标准方面,先秦道家和儒家一样推崇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老子提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老子还讲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6],p.10, p.50, p.58)将“俭”视为一“宝”,足见对其重视。

与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相比,道家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理解更为深刻,更有普遍性。儒家的“以道驭术”观念只是强调技术活动的社会后果,用道德教化协调技术活动中的人际关系,而道家的“以道驭术”观念还涉及如何协调技术活动中操作者与工具的关系、人的身心关系、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涉及所有技术活动要素的和谐。道家的观念在先秦时代似乎并未体现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一直对今天的技术发展仍有现实的启发意义的“以道驭术”观念,恰恰来自道家的理解。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反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7],p.140)

三、法家的“以道驭术”观念

法家关于法度的思想，对技术发展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法”的本意之一就是技术标准。如《管子·七法》中所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商君书》上说：“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韩非子主张，君王放弃法术而任心治，就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工匠放弃规矩尺寸而凭主观臆测，就是能工巧匠也不能制好一个车轮。这不仅是谈治国方略，也是在谈对工艺标准的态度问题。《韩非子·饰邪》中还说：“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志，惑乱之道也。”在李约瑟看来，秦国的勃兴与其军事上的某些技术发明有密切关系。而这些发明的出现，又不能不考虑到重视法度的思想背景。（[7]，p.237）这同样是在“以道驭术”，它强调的是对技术规范的严格要求。

与儒家抨击“奇技淫巧”，道家倡导节俭相类似，法家对“雕文刻镂”之类华而不实的技术活动也表现出极大反感。法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李悝提出了“禁技巧”的崇俭主张。他帮助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提出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认为农是国之本，“农伤则国贫”。他的“以农为本”的观念，对巩固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有明显作用，但往往从消极方面看待工商活动的社会影响，把“技巧”同奸邪淫佚联系起来，实际上限制了工商活动中技术的发展。

商鞅在“重农抑工”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在《商君书·农战》中将“技巧”同“商贾”并论，认为必须加以限制，才能保证国泰民安。韩非子也有类似观点。他说：“仓禀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纂组、锦绣、刻画为未作者富。”“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末作。”在他的《五蠹》中，还把“商工之民”比作社会的蠹虫。（[8]，p.164，p.183）先秦法家对工商活动中的技术持限制态度，目的在于维护农耕经济的稳定发展，防止将技艺过多用于奢侈的需求。从维护社会生活稳定和倡导淳朴民风的伦理角度来“禁技巧”，其前提是根据农耕经济的需要来取舍，但这里留给技术本身的发展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四、管子学派的“以道驭术”观念

管子的思想兼有道家、名家、法家成分，其技术伦理思想需要专门加以论述。管子对技术的应用持积极态度，这就是“立器械以使万物”，即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制作器物，以役使并支配自然界，为人们谋取福利。管子对所谓“奇技淫巧”也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管子》一书中说：“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农以劳矣，而天下饥者，其悦在珍怪，方丈陈于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绣。”在他看来，技术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给国家与百姓带来财用。如果不能带来财用，只是丧志败德的玩物，那么，最精巧的技术也只能贬之为“淫巧”，不仅不能提倡，而且还必须大力禁止，严加惩罚。

《管子》中把“雕文刻镂”的工事称之为“末产”或“末生”，把“锦绣纂组”的女织称之为“文巧”。《治国篇》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管子还认为，“审量度，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这里是说，国家和百姓无积蓄而讲排场，是奢侈国家的风俗，势必产生贫穷和浪费。

值得注意的是，《管子》中还主张适度扩大消费有利于推动生产，这和管子比较看重工商活动的价值有一定关系。《侈靡篇》中说：“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这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倡导奢侈，而是说工商业活动在一定条件下需要适度消费的推动，因而《管子》中强调“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时化”指的是“因时而变”，“侈靡”重在“善于”，而非过度。管子认为，人的德性的完善主要不是依靠自我修养、反观内省，而是依靠物质生活的富裕。因此，要振兴民德，就必须厚养其生，输财于民，遗利于民，宽其政，救民之急，赈民以穷。通过给予民众以物质利益的途径，培育其德性，然后在“知德”的基础上，导之以行义有礼，而技艺则在其中起着促进作用。（[9]，p.608，p.90，p.392，p.121）

五、墨家的“以道驭术”观念

墨家是反映先秦时代工匠和平民观念的典型代表。墨子本人就是一个精通器具制造的工师和思想家。墨家的技术伦理规范的特色在于比较注重技术活动的微观社会效果，即工匠个人的道德修养。墨家“以道驭术”在技术思想中的体现，是注重以技术道德规范约束群体或个体工匠的技术活动，要求门徒学习大禹治水吃苦耐劳栉风沐雨的精神，毫无功名利禄之心，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10]，pp.88-89、p.285）《庄子·天下》篇中介绍说，“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跣踣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并说：“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这些要求显然是直接规定其门徒、工匠的技术道德和行为规范的。

在评价技术成就时，墨子主张“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公输盘（即鲁班）造竹木鸢，能在天上飞三日而不下，一般人都以此为巧，墨子却认为这不如制作车辖，因为车辖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对天下人都有利，故所为巧。[11]墨子目睹当时一些身怀绝技的科技人才，投靠强权势力，用技艺为侵略战争效力，便挺身而出，晓之以理，并以自己的技术实力作威慑，制止了战争，维护了黎民的生命财产。流传千古的名篇《墨子·公输》在宣扬墨子“非攻”思想的同时，也阐明了墨子关于技术当“兼利天下”的主张。“兼利天下”既是墨家的政治主张，也是对技术发展的道德要求。

墨家学派对技术应用中的奢靡风气同样持反对态度。《墨子·辞过》篇里说，古代圣王建造宫室只是为了方便生活，而不是为了观赏。而“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必厚作斂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耗费大量财力，搞得“国贫而民难治”。古代圣王穿着衣服只为便利身体，不求过分华丽好看。而“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必厚作斂于百姓，暴夺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这是“殚财劳力，毕归之无用也”。如此形成风气，则“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必然导致天下大乱。

六、“以道驭术”观念在当时的影响

“以道驭术”观念在当时的影响，体现在工程技术、农业生产、医疗卫生等许多领域。

由于儒家、道家、法家、管子学派和墨家等都激烈地抨击“奇技淫巧”，反对技术应用中的奢靡之风，先秦时代在建筑设计、装饰、家具陈设等方面总的说来还是比较简朴的，这同后来封建帝王的奢华生活形成明显对比，同古代欧洲皇宫金碧辉煌的陈设、精美绝伦的雕饰更形成鲜明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以道驭术”的社会效果。

先秦时期出现了负责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工师”。“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荀子提出“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以使得“百工忠信而不惰”。([2],p.137,p.200)《礼论·月令》规定，“孟冬之月（农历十月）……，命工师效公，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物勒工名”实际上是工程技术伦理的制度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地下出土的文物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可以证实这一制度化的工程技术伦理的存在。如在春秋时期齐国都城临淄遗址就出土有刻着陶工名字的陶器；在战国时期秦、魏、韩、燕、秦、中山、齐等国遗址，所出土的这类刻有工匠名字的陶器更多。这里应该指出，“物勒工名”的“工”，不仅有工匠，还有工师等官吏，表明这一制度伦理还包括对技术监督管理者的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要求。([12],p.4)

《管子·五辅》以“诚工”称谓有道德的工匠，主张“非诚工不得食于农。”“古之良工，不劳其知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失。”良工是恪守技术规范而不制作玩好之物的工匠，所以毫无价值的东西，守法的工匠是从不生产的。结合生产活动进行伦理教化、工师监督、“物勒工名”等措施，对工程技术活动中“以道驭术”观念的贯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农业生产上，“以道驭术”表现为比较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

先秦儒家伦理以“仁”为中心。由于生物和自然界对人有价值，因而儒家主张把仁爱的原则扩展到生物以及养育生物的自然界。儒家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中庸》篇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参天参矣。”这里的关键在一个“赞”字。它指的是人类的技术活动应该依照自然界的规律，赞助天地的化育过程，使之产生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结果。这不仅意味着不要倒行逆施，违背自然规律，同时也意味着不要取代自然界的化育过程，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不要无所作为，听命于自然界的摆布。

“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原则，决定了保护自然界生物资源的自觉行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自觉保护自然界生物资源的施政传统。在《礼记·月令》中，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各季各月的具体规定。孔子明确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主张。孟子提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3],p.5)荀子说：“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2],p.285)

《庄子·天地》提出“爱人利物之谓仁”。这里把“爱人”和“利物”作为同样重要的道德要求，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先秦道家对技术的不恰当应用带来的不道德现象给予激烈抨击，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技术的不恰当应用破坏了生态环境的正常秩序。庄子说：“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铍罔罟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罟罟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5],p.215)管子比较注意从经济角度考虑环境的价值。他强调“四禁”：“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9],pp.426-427)“四禁”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禁止破坏农业生态环境，因为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就会发生水、旱、虫灾，造成“民多夭死，国贫法乱”的严重后果。

总体上看，先秦时期的环境伦理观念，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具体措施上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不仅为后世的环境伦理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使当时的农耕文化蕴含深刻的生态智慧，有效地协调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保证了农业经济日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先秦时期生态环境还未受到大的破坏，当时黄河中游气候温和，植被良好。黄河下游气候湿润，湖泊较多，决徙甚少。([13],p.212)在生态环境相当好的时候，先秦思想家就已对破坏生态环境可能出现的恶果提出警示，的确是非常难得的。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强调“以道驭术”，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稳定持续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医疗卫生领域，“以道驭术”体现为强调医生的职业道德。儒家以“仁恕博爱”之德为中心，提出“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论语·子路》中提出：“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孟子说：“无伤也，是乃仁术”这要求医者本身成为仁者，将仁义道德贯穿于行医的全过程。

成书于战国和秦汉之间的《黄帝内经》对医学伦理的原则和规范已有论述。

《素问》中有两篇重要文献，即“疏五过论”（分析医生行医的五种过失）和“征四失论”（造成“五过”的四种原因），其中有许多涉及医学伦理的论述。《黄帝内经》还提到，医疗关系到人的性命，医术必须传给关心病人疾苦，具备忠诚为民众服务的高尚品德，又有热爱医学事业，聪明好学，刻苦钻研精神的人，方可“识契真要”。所以，对医学生或学徒的挑选应该极为郑重。《黄帝内经》中对医学伦理的论述对后世医家有相当大的影响。后来的医学伦理规范根据时代发展有一些新提法，涉及一些更具体的要求，但基本思想特征自先秦以来是一脉相传的。

七、“以道驭术”观念的现代意义

我国先秦时期“以道驭术”的技术伦理观念，是在自然经济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其某些合理成分在仍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先秦时期“以道驭术”的机制，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用伦理道德观念约束技术活动的观念，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

“德”的理解同西方的伦理(Ethics)道德(Morality)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在西方伦理思想体系中,核心的概念是“公平”、“正义”、“责任”、“信誉”等等,反映出与工商活动的密切关系。伦理学研究注重从最基本的原则出发,通过推理导出具体的道德规范。传统的西方伦理思想关注人的德性和社会的道德秩序,直到近年来才在生态伦理研究中强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与此相比,我国先秦时期对“道”“德”的理解很早就涉及“仁民爱物”、“爱人利物”的观念,在维护生态环境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并且思考了技术活动中人的身心关系、操作者与工具器物关系蕴含的伦理问题,这是非常难得的。过于关注人际关系和功利价值的伦理观念,容易导致过度征服自然的的活动。在反思工业社会中过度征服自然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和技术异化现象时,在探索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先秦时期“以道驭术”的观念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先秦时期“以道驭术”的观念还涉及对技术活动社会后果的伦理评价。尽管对“奇技淫巧”的抨击和“抑奢”的主张是从自然经济需求出发的,但防范技术活动可能产生误国害民后果的观念和措施有一定合理性。技术上能做的事情并不是伦理道德意义上该做的事情。失去伦理道德驾驭的技术发展,只能是为了功利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技术具有强大威力的今天,“以道驭术”显得尤为重要。

先秦时期的“以道驭术”,是观念和行动的有机结合,伦理意义的思考紧密联系国计民生的实际,联系技术活动的社会管理和工匠的操作过程。思想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并不能直接变成普通民众特别是工匠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这里要经历一个不断教化熏陶的过程。先秦思想家对德行优良的能工巧匠加以赞誉,对技术活动中的歪风邪气加以鞭笞,使人们通过具体事例有所体验,有所遵循,这种技术伦理的传播教育方式值得借鉴。显然,如果现代学者们的技术伦理研究成果丰厚,却没能遏制不良技术活动尤其是假冒伪劣产品方面发挥有效作用,那就表明“道”尚未真正“驭术”,就需要做出更为切实的努力。

[*] 本文系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项目《中国科技伦理思想演变研究》(批准号: J05001)阶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王前(1950—)男,辽宁沈阳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

[参 考 文 献]

- [1] 孙宏安, 中国古代科学教育史略[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 [2] 孙安邦译, 白话荀子[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 [3] 焦杰校点, 孟子[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4] 黄永年校点, 论语[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5] 李回, 庄子译析[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 [6] 刘庆华等译注[M], 老子·庄子, 广州: 广州出版社。
- [7]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8] 秦惠彬校点, 韩非子[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9] 滕新才等译注, 管子白话今译[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4。
- [10] 汝莉、李生荣, 中国科技教育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 [11] 墨子*鲁问(关于这段史实, 另有一说。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 当弟子大赞“先生之巧”时, 墨子当时纠正说“不如为车輓之巧也”, 因而获得惠子的称颂: “墨子大巧, 巧为輓, 拙为鸢。”)
- [12] 徐少锦, 中国传统工匠伦理初探, 审计与经济研究[J], 2001。
- [13] 中国社会调查所, 中国国情报告[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孟建伟)

